

界定政府收入规模与“小政府大社会”

□本报观察员 赵勇

这么多年以来，“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我们的努力目标，如果把这个目标细化到财政收入上来，就会带出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政府手里的钱是不是越多越好？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的一条建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这条建议提出“合理确定政府性收入总规模，实现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的合理均衡增长”。媒体乐于将这番话放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大前提下来解读，但实际上，“合理确定政府性收入总规模”，并不完全是收入分配的问题，它提出的问题，恰恰是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实践“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

所谓的政府性收入，无非是税和费，合并起来，可称之为财政收入。大家知道，我国的财政收入增幅多年以来一直高于城镇居民工资增幅，甚至也高于很多人引以为豪的GDP增幅。这其实也就意味着，政府手里的钱越来越多。但社会财富总量是一定的，蛋糕就那么大，政府手里的钱多了，企业和老百姓手里的钱就少了，现在都在讲收入分配改革，我看，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财政收入占有社会财富比例到底该有多高？这个大问题不搞清楚，只着眼于企业和个人之间调整

的收入分配改革，恐怕只能是隔靴搔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对合理确定政府性收入规模的建议，其重要性怎么评估都不过分。

8月27日的《新华每日电讯》就有评论文章提出了一个问题——政府收入量入为出还是量出为人？作者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够发达时，政府收入应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收入较为丰盈之时，就未必需要继续增加，而应当确定一个适当的政府收入总规模。与此相对应，当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够发达时，财政支出应当“量人为出”；而当政府收入较为丰盈时，财政支出就应当“量出为人”。财政“量人为出”的弊端在于，当政府收入超过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之需时，剩余的钱就会被胡乱花掉。由于政府收入规模不受限制，政府总是倾向于更多地收钱，然后更多地花钱，形成恶性循环。所谓“量出为人”，就是在厘清政府职能范围的基础上，政府需要花多少钱就收多少钱，不多收，不乱收，将政府收入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这篇评论文章部分指出了界定政府收入规模的意义所在，但有些话感觉还没说透，事实上，界定政府收入规模，本质上是对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是要大政府小社会代表的行政拉动型发展模式，还是要小政府大社会代表的内生

性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实行的一直是“低工资”模式，主要原因是因为经济基础薄弱，为了完成社会发展的原始积累，要把社会财富更多地集中在政府手中，也就是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改革开放的一个最大的成就，就是逐步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个转型的过程，催生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很多人都在解读“中国模式”的秘密，其实这个秘密很简单——政府放权，充分释放社会内生的活力。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根植于市场的中小企业蓬勃发展，如果没有财富向民间转移的进程，中国经济如何能保持几十年的高增长？到了今天，事实已经充分证明，政府管好民生，在其他领域让社会充分发挥活力，远比政府什么都管的模式有效得多。

但政府增收的冲动依然存在，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表示，我国将实施一系列税收体制改革，通过推进房产税、资源税、个人所得税改革，开征环境税和社会保障税等措施，重点增强地方财政收入能力。这个表态的思维仍然是——财政收入越多越好。就徐林司长的这一表态，8月26日的《华西都市报》有评论文章提出不同意见：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不能靠增税。作者认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途径无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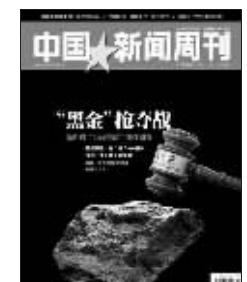
两种，一是增加民众和企业的税负，地方政府多收一点，民众和企业多缴一点；二是在不增加税负的前提下，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分享比例，地方政府多拿一点，中央政府少拿一点。第一种途径不可取，只能在第二种途径上下功夫。

与这个例子相对应的是，按家庭负担征收个税的呼吁虽然存在多年，在各国也行之有效，但却一直无法在我国实行。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近日旧话重提，再度呼吁税收体制改革，尽快实行按家庭负担征收个税。更能体现税负公平的按家庭征个税之所以无法在我国实行，其根本原因，恰恰是一些官员对“财政收入减少”的忧虑，一旦“政府的钱不能少收”成为考虑问题的前提，让利于民很多时候就会沦为空谈。

8月26日是深圳特区30周岁的生日，8月27日的《新京报》社论文章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但它的内涵其实并不复杂，简单地说，实际上就是给民“松绑”、“还权于民”，让他们自由地凭借各自的聪明才智、努力甚至运气，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生活。我想，“合理确定政府收入规模，让老百姓多分一点蛋糕，让社会再多一点活力，让小政府大社会离我们更近一点”，这些愿景，其实也很适合拿来做深圳特区30岁生日的庆生词。

刊视界

8月26日《中国新闻周刊》



陕西省人民政府密函压最高人民法院，一时引起公众瞩目。行政权和司法权对抗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呢？是煤，是蕴藏在陕西榆林——这片中国传统贫瘠不毛之地下面的价值千亿人民币的黑色金子，催生了这幕情节曲折，关系错综复杂的悬疑推理剧。

《中国新闻周刊》深入调查发现，当地近期发生的两起矿权纠纷，起因不在于法律不健全，而是因为部分的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深深卷入到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利益主体的商业博弈中。

8月24日《瞭望东方周刊》



30年过去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三十而立，这个先行者留下了什么精神遗产？回顾、梳理深圳历史，讨论下一步的发展定位与方向，我们还是再次回到开拓缺口、建设深圳的那个高歌猛进、激情澎湃的时代，以期在这些改革开放的开拓者与践行者的“精气神”里汲取营养，造就更为坚实的未来。

»一周贴吧



[标签] 27日，国务院召开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温家宝在讲话时强调健全行政监督体系和问责制度。温家宝说，要重视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支持新闻媒体对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进行曝光。

[跟帖]

ID:onlyyou

支持，政府的权力必须有所监督，言胜于行，执行力是关键。

ID:mxy002

惩处几个跨省追捕发帖者的责任人，比啥都好使。

ID:人云亦云我更云

对违法行政者，不但要坚决曝光，还要一查到底，追究违法行政者的法律责任！

ID:一生有你足矣

如果能落实到基层，那是非常可观的执政进步！



[标签] 江苏射阳县纪监室的一位副主任在县人民医院跳楼身亡。经警方初步认定，死者生前患有抑郁症。

[跟帖]

ID:勒菲德路

高水准的解释。

ID:你戒烟了吗

都生病了还在为人民服务，感动中。

ID:说了就舒服

眼下会得抑郁症的官，一般还有良心！！！

ID:万水千山...

现在各个行业包括官场同样竞争激烈，抑郁症患者会逐渐增多，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ID:病人当政

警方是看的死人，死人生前有抑郁症都看得出来？

快报记者 赵勇 整理



(08.23-08.28) 黄集伟专栏

用一个重大的错误来更正一个重大的错误

1 新闻商人

来自新京报本周《新知周刊》，原文标题是“‘新闻商人’买卖八卦秘闻发财每天找八卦素材”。文章以娱乐达人拉里·加里森为个案，发现尽管加里森名片上印有娱乐公司总裁、新闻中介、记者、顾问、独立制片等繁多头衔，可他真正的工作是一位“新闻商人”，即通过为媒体提供八卦新闻线索大赚其钱。

2 即使一个命运悲惨的烂人一生中也该得到一朵红花

语出影评家卫西谛本周微博，是卫士观看山田洋次新品《弟弟》的心得：“这年头好电影越来越少，但至少还有一个人拍的，每次都让我老泪纵横——山田洋次。《弟弟》：即使是一个命运悲惨的烂人，一生中也该得到一朵红花。朴实无华，感人至深。”

3 用一个重大的错误来更正一个重大的错误

来自南方周末记者方可成、胡

贲、阿乙有关8·23劫案专题报道，语出劫持者门多萨：“绑架香港游客成为了门多萨‘寻求公正’的最后一步。在顺利控制了大巴车之后，他很快在车窗上贴出了一张纸条，上面用英文写着：用一个重大的错误来更正一个重大的错误……此后十几个小时，全世界的观众通过电视直播目睹了这场由劫匪与人质、警察与混乱、枪战和流血交织而成的悲剧。在这场以多人丧生为代价的悲剧中，门多萨一开始贴出的纸条仿佛就预示了过程和结局：没有任何‘错误’被纠正，有的只是错误，错误和错误。”

4 知识混子

最早来自几年前辞职下海以修理电动车谋生的清华大学博士董冰。接受媒体采访，董博士创意新词“知识混子”。董博士给出的定义是：“我就是个知识混子，心思就沒在学术上。我不骗别人，我也搞不出太多学术的东西来，但按照中国的学术体系，到了一定年头，按资历我也可当上教授。”本周，这一旧词被一些评家再次翻出。从“知识分子”到“知道分子”再到“知

识混子”，关于知识者的称谓变迁可以编一部辛酸小百科了。

5 微博减肥法

来自作家土摩托本周微博：美国正流行“微博减肥法”，就是把自己每天吃的东西发微博，让粉丝监督并提建议，效果很不错哦。

6 五六十岁还要婆婆妈妈的阿哥阿妹入草丛恶心死了

语出台湾歌手陈升。接受《南都周刊》访问，陈师谈到自己创作之变：一改以往情歌为主打的做法，新专辑里谈情说爱的成分几乎没有……“哪有人一直到老都还在深情，五六十岁还要婆婆妈妈的阿哥阿妹入草丛，恶心死了”，他站起来来回跳着扮演怪蜀黍，嘴里还不停念叨着“怪蜀黍，怪蜀黍，我是怪蜀黍”……

7 可粉度

由学者严锋发明的一个新词，指那些在网络上或因趣味、或因状态、或因思想理念而值得期待或关注的微博或博客。

8月26日《南都周刊》



“奶粉导致婴儿性早熟事件”揭开了潘多拉盒子，一时间，激素成为一大热门话题，全民关注焦点。从牛、羊到猪……顿时都被圈入激素阴影。人们怀疑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激素杀手”潜伏在我们的嘴边。

现代食品工业早已全面掌管了对人们饮食的控制权。当科技与工业社会的规模效益、速度效率这样的发展逻辑相遇，生化技术与食品行业呈现出高度的亲和力：自然的生物周期被改变、生长的过程被精确控制，于是，产量增加了、卖相美观了、口感舒适了……在现代食品工业追求速度与利润的链条下，我们发现激素早已无处不在。

快报记者 赵勇 整理